

□ 胡朝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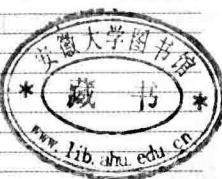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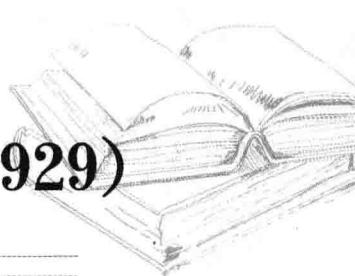
媒介文化视域下的 报人小说研究(1920—1929)



新华出版社

□ 胡朝雯 著

媒介文化视域下的 报人小说研究(1920—1929)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媒介文化视域下的报人小说研究：1920～1929 / 胡朝雯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66-0097-9

I. ①媒… II. ①胡… III. ①现代小说—小说研究—中国—1920～1929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2619号

媒介文化视域下的报人小说研究：1920～1929

作　　者：胡朝雯

出版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赵怀志

封面设计：燕清创意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3.25

字　　数：156千字

版　　次：2012年9月第一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097-9

定　　价：2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引言

在越来越多地追问、重审现代文学知识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今天，一些文本被重读，一些作家幸运地浮出历史叙述的地表。这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事实是，长期以来被打入文学史另册的“鸳鸯蝴蝶派”终于开始站在与新文学并列的位置进入文学史的叙述了。“事实是，文学的母体应分为‘纯’、‘俗’两大子系”，范伯群先生说：“在这近20年中，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我们文学的双翼，今后编撰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①“通俗文学”的命名去除了“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等名称的贬义色彩，范先生提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一体两翼”的主张，可谓化腐朽为神奇的一笔，使它们有了和新文学并驾齐驱的理由。

不过，将它们定义为“通俗文学”仍是值得继续追问的。众所周知，在现代汉语中，“俗”本是与“雅”相对的词。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或曰严肃文学）对举，显然存在着语言逻辑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将“俗”与“纯”相对举，多少暗含了“通俗文学”还不够“纯”、不够“严肃”的意思，由此可知“一体两翼”的提法本意在替

^①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和第35页。

“通俗文学”正名，但论者并未彻底消解以新文学为本位的价值立场，至少是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犹豫与矛盾。

为他们命名的确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

“礼拜六派”一说，来源于他们编辑的一份有名的刊物。这一名称就他们注重消闲，讲求趣味的文风而言，还算贴切。可是，他们中最主要的成员包天笑否定自己属于此派，最为有力的证据是他从未在《礼拜六》刊物上发表过小说。^①当然不止包天笑，他们中不曾曾在《礼拜六》上露面的尚为数不少。更为重要的是，“消闲”、“趣味”固然是他们争取读者的主要手段，却不能高度概括这些文本的内质。他们承续梁启超以来以小说开启民智的思想，亦不乏关注社会、关怀人生的使命意识。

“鸳鸯蝴蝶派”一名的来由众说纷纭^②，但大概主要还是来自《花月痕》中的这类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这一称谓说明言情是他们之所长。但其实他们的小说涉及了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会党等各类题材。正如也曾被称作“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平襟亚在《关于鸳鸯蝴蝶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所谓‘鸳鸯蝴蝶派’既不像武术界中所分的少林、武当、峨嵋各派那样师徒相承，真有这么一种派别；也不像后来

^① 见包天笑：《我与鸳鸯蝴蝶派》，原刊1960年7月27日香港《文汇报》，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文学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126页。

^② 见平襟亚：《“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选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出现在文坛上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派那样的有组织、有规章，还有机关刊物，公然挂着牌子。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名称是由群众起出来的。”为他们取名的“群众”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反对者、批判者，这个名称带着较大的随意性，其所指范围随着批判者的立场和需要的改变而不断地扩大。

“鸳鸯蝴蝶派”固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派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确实体现出一些共性。而“消闲”、“言情”等都只是他们体现出来的部分的、外在的特征，最能说明他们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是他们集报刊编辑与小说作者^①于一身的职业身份。“中国职业作家的出现，其过程大体是这样：第一步是报人的出现，第二步是报人小说家，第三步才是职业小说家（作家）的诞生”。^②这里的“报人”是指近代中国第一批通过办报纸获得固定收入的职业者，比如王韬等。而“报人小说家”是指1890年代中叶之后，通过文艺小报登上文坛的小说家，如李伯元、吴趼人、韩邦庆、孙玉声等人。随着报刊小说稿酬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小说作者能够依靠稿费作为固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于是便有了“职业小说家”。

1920年代，中国报刊小说进入全面的、成熟的商业化时代。1920年代上海报业中最畅销的三大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副刊的主编（严独鹤、周瘦鹃、包天笑）都从事小说创作。同时，从事畅销小说的作家又多身兼报刊编辑。这群文人大多以服务媒体为职业，以

① 事实上，他们写作的文本几乎涵盖了中西古今各种文类，包括小说、新闻、影评、戏评、弹词、杂文、随笔、译著、诗词、曲选、尺牍、日记、广告等。但本书仅以他们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主要论述对象。

② 郭延礼著：《传媒、稿酬与作家职业化》，选自郭延礼主编：《中国文学精神》，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写稿为安身立命的主要方式。他们创作的小说都首先在报刊上发表，因此，本书称之为“报人小说”，报人小说的作者则称之为“报人小说家”。

现代报人小说大多只在当时报刊一次性登载，随之淹没于时间的河流，不再被人们注意。更主要的是，即使是那些后来结集成书出版而广为流传的报人小说，也被贴上“通俗小说”、“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的标签，打入文学史叙述的另册，使之再度沉没。以至于我们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现代报人小说“直待《新青年》的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①而沉寂下去。

其实，1920年代的报人小说创作并不因为五四“新文学”强势的理论进攻而萎缩。他们在与新文学同样的生存语境中，甚至显现出相较后者更为强劲的实力。单就长篇小说而言，其读者面之广、读者人数之众以及所反映的生活面之宽、影响之大，在今天看来，都能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构成。而新文学虽然在1922年也有了张资平描写留日中国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王统照抨击旧家族制度的长篇《一叶》《黄昏》，此后，张闻天的《旅途》、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都相继问世。但是，这些作品或是宣传的概念和气息大于生动的表现，有“即兴小说”、“公式小说”之嫌；或是缺乏长篇的气度与架构，显出艺术上未臻纯熟之境的稚拙来。直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才出现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等较为成熟的长篇巨著。

①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8月12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选自魏绍昌：《鸳鸯蝴蝶研究资料上卷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二

鉴于其不容忽视的文化影响力，对报人小说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便开始升温。虽然这些研究仍在沿袭约定俗成的“通俗文学”或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民国旧派小说”^①等名称，但在确认其文学内质时，有了许多角度与方法上的新的尝试。

贾植芳认为：“新文学作家由于其出身教养和生活世界的局限，他们作品的取材面也比较狭小和单薄，从所反映的生活场面与人物类型看来，最成功的往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这两大类形象，对于范围广阔、结构复杂的中国社会的各式各种生活领域，由于接触面不广不深，留下了许多空白之处。而通俗作家却是另一类人，他们出身教养和求职谋生手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像他们所涉足的社会领域的复杂性、多样性一样，这就为他们的作品取材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因此，他们笔下出现的社会场景和人物形象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往往为新文学作家所望尘莫及。”^②这段话以“通俗作家”之所长比新文学作家之所短，准确概括了报人小说在题材上涵盖面宽的特点。相较于夏志清在1950年代谈到的：“这些作家不关心社会，对西方传统也所知甚少……不一定有什么文学价值”^③，对待报人小说的态度显然要开放很多。

① 见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② 贾植芳：《反思的历史，历史的反思——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序》，选自范伯群著：《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章·文学革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刘扬体在《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①一书中呼吁对鸳鸯蝴蝶派的“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的“现象作理论研究”，并在价值观念与社会心态方面作了一些探讨，指出其“时尚”、“商业化”的特征。在“消闲”、“趣味”等特点被新文学从文学角度给予否定之后，试图为其赋予社会学、文化心理学上的意义。这让人联想起林培瑞（Perry Link）在八十年代初所作的论断，即“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消闲”功能在于纾解由于现代性所带来的紧张与焦虑。这种分析以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都市文化为参照背景，深入到都市现代性机制之中，比单纯对其文化外表分析更深一层，它来自西方有关现代性产生的理论。虽说这一理论模式对于“半殖民”上海的特殊情境是否适用尚需要深入探讨，但它对于本书改变惯常的研究思路，发掘“消闲”中的“意义”很有启发。

台湾学者赵孝萱的《“鸳鸯蝴蝶派”新论》^②力图突破“新文学”的单一史观，针对“雅与俗”、“新与旧”、“严肃与消闲”等对立观念进行另类思考。在贴近文本分析，打破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方面，对本书有较大的影响。

英国汉学家贺麦晓（Michel Hockx）在《风格问题》（*Questions of Style*）^③一书中运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对于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的研究提出新的“范式”，即：新文

① 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6—7页，第59—63页。

② 赵孝萱：《“鸳鸯蝴蝶派”新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y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ese,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p.5, 转引自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229页。

学应当被看做包含多种风格的，且与其他风格处于共存、竞争的现代写作。他把代表“旧派”的文学杂志和五四新文学放在一起平行阅读，从比较中描述这些社团及杂志的异同。他的研究旨在挑战“新文学范式”（New Literature Paradigm）的话语霸权。他认为李欧梵、王德威等人的研究与重估现代文学经典，并没有构成真正的“范式变革”，因为它并未颠覆这样的基本预设，即：五四文学是民国时期的主流风格。书中平行阅读的尝试直接启发本书将五四“四大副刊”小说与传统副刊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而书中以大量翔实的资料、严密的理论框架论证挑战了传统的命题，为本书所望尘莫及。但它使本书在打破“雅”、“俗”二元对立的基础上来立论时，深生吾道不孤之感。

三

本书始终将报人小说置于与新文学相比较的视域中进行论述，但同时力图不在新文学所定义的“意义”范围来探讨报人小说的价值。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找到诸如最先翻译西方小说、“平民化”的追求、也写号称“问题小说”的小说等一类例证来做注脚，从而得出他们具有与新文学同样的“现代性”的结论，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能使报人小说的品质得到提升。新文学批评者们早就在1920年代就曾指出：“《礼拜六》的诸位作者的思想本来是纯粹中国旧式的”，“却也时时冒充新式，做几首游戏的新诗，在陈陈相因的小说中，砌上几个‘解放’、‘家庭问题’的现成名词”。^①这并非新文学批评者“不许革命”的霸道。单单根据新文学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小说家选取一段人生来描写，其目的

^① 西谛：《思想的反流》，引自魏绍昌主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不在此段人生本身，而在另一内在的根本问题。”^①把体现出“内在的根本问题”作为小说的终极目标，这种主观意图，我们确实很难在报人小说里发现。

其实，如果试图用新文学的价值话语来重新阐释报人小说的“意义”，终将不免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用这种超历史的标准去判断它，企图将其从“封建的、堕落的泥沼中”打捞出来的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报人的价值只在这里，那么它当然永远无法同以这种“现代性”为基本诉求的新文学相提并论。

那么我们将在什么层面上来探讨报人小说的价值？文化研究的角度是近年来较为常见的方法。由于报人小说反映的生活面广，很容易将它们的价值定位在展示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料的层面上。或者将报人小说的生产纳入到现代都市文化商品的机制中探讨，从物质层面和制度因素去打量文学现象，这确实是对那种孤立的“文本细读”带来的片面的有效反拨。但如果一味地沉醉于文化史的研究，必将忽视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便可能导致对于物质因素、经济基础的关注掩盖了对于美学方面的考量。毕竟，1920年代的报人小说大多是由对文学有着执着的审美追求的文人创作，完全值得也应该让我们作出文学价值层面的判断。

因此，本书一方面力图不放弃文本（包括和文本关系密切的“副文本”）细读，对报人小说的文学价值给出直接的判断；另一方面引入读者接受的维度，通过文本本身结合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因素，对读者阅读产生的吸引力来考察报人小说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努力使“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既极力还原出文本生成的语境以及文本对语境的影响，也不让文本离开审美的分析而沦为文化研究的注脚。

^①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引自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1页。

》》》》》》》》》》》》》》》》 目 录 》》

引 言	1
-----------	---

第一章 小说与报刊的历史渊源及相互影响之关系

第一节 小说与报刊结缘及“报人小说”的产生	5
一、小说作为“群治”工具而登上报刊 / 5	
二、1920年代的“报人”与“报人小说” / 8	
第二节 作为副文本的报刊内容与小说传播、接受的关系	18
一、报纸副刊与报人小说的“消闲” / 20	
二、报刊新闻与报人小说的“真实” / 24	
三、报刊图片与报人小说的大众接受 / 28	

第二章 1920年代主要文学报刊、出版机构与报人小说的关系

第一节 以严独鹤为灵魂的文学报刊及世界书局小说出版	39
一、报刊概况 / 40	
二、严独鹤与世界书局的商业策划与运作 / 47	
第二节 以周瘦鹃为中心的文学报刊及大东书局小说出版	50
一、主要期刊概况 / 52	
二、周瘦鹃系列刊物之特色与大东书局的出版业 / 62	
第三节 《小说世界》与《小说月报》改组及商务印书馆小说出版 ...	64
一、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小说世界》 / 65	
二、《小说世界》与改组后的《小说月报》之关系 / 68	
三、胡寄尘与商务印书馆 / 75	

第三章 报人小说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连载小说特殊的文本制作方式	83
一、随写随刊——读者和作者的互动下的连载小说 /	85
二、“作为单日的畅销书”——连载小说对读者“想象共同体”建构的意义 /	94
第二节 报人小说与其他大众媒介的共生状态	103
一、1920年代小说对电影、戏剧的贡献 /	105
二、电影、戏剧对小说的影响 /	112
第三节 报人小说类型化与读者阅读期待的互动	121
一、社会言情故事的讲述与阅读 /	125
二、社会言情故事于“消遣”之外的意义 /	132
 第四章 1920年代报人小说与“五四新文学”的对立与互动	
第一节 从《上海画报》上的另面胡适说起.....	147
第二节 五四时期“四大副刊”小说与传统副刊小说.....	151
一、从“四大副刊”的发展历程看他们和传统副刊的关系 /	153
二、“四大副刊”的趣味性宗旨 /	162
三、五四语境下的“四大副刊”小说与传统副刊小说 /	165
第三节 新文学与报人小说的三次理论论争.....	170
一、更接近单方面的“讨伐”而非“论争”的第一次对垒 /	170
二、由《小说月报》改组及《小说世界》出刊引发的第二次论争 /	176
三、《申报·自由谈》易主后的第三次论争 /	185
 结 语.....	191

第一章

小说与报刊的 历史渊源及相互影响之关系





1960年代，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论断，他对此作出阐释说：“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食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①这种“人体延伸论”重新定义了媒介，它第一次确立了媒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决定性主导地位，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模式。

一种文学风格的形成固然和作者的文化思想、个性特征、审美趣味有关，但与它所依赖的主要传播媒介也有着重要关系。小说从以单行本流传于世到与报刊结缘，经历着一种传播媒介的重要变化。当小说文本形式主要依靠说书场上的“说”时，它的体式构成呈现着与受众面对面交流形成的审美特征。当现代小说依赖的主要是以印刷为主要传播手段的报纸和文学期刊时，随着媒介的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读者接受信息方式的改变，小说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920年代是商业化报纸、杂志较为发达的黄金时代。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一个以报纸、杂志为中心的文学时代。而小说又是与报纸、杂志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一文学形态（和报纸杂志联系在一起的小说）本身作为独立的、完整的、系统的研究对象，将小说从相对固定化的作家文集、文学选本中解放出来，放

^① 见（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媒介文化视域下的报人小说研究（1920—1929）

《《《《《《《《《

》》》》》》》》》

回到它们当时赖以“生存”的大众媒介当中（而不是把小说与报刊剥离开来，分别当做阐释文学史、社会史、文化史的素材），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调整阅读姿势与理论预设，从而给出我们作为文学史观察的，与通常的新闻学、历史学或是文化研究不一样的阐释。